

市场经济与高教运行中的“选择”

Market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龚 放

(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 南京 210008)

提要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极大地强化高等教育运行中的“选择性”。选择主体的泛化,选择的双向性和多样化,选择与竞争,特别是资源配置中的竞争的密切相关性,将对高等教育的决策和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全面、深刻地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选择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从而正确地选择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式、途径与侧重点,已经成为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要课题。

1972年,由埃德加·富尔领导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递交了一份题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研究报告。报告把“教育成果与社会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同“教育先行”、“教育预见”并列为值得重视的三种新的现象。报告认为,世界正发生急剧变化,“教育必须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必须更好地符合学习者的意愿和能力”。当学校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时,“有些社会正在开始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

80年代末,上述报告所指出的这种新现象在中国也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开始受到社会用人部门的挑选,有些学校、有些系科的“教育成果”,甚至遭到社会的冷落和拒绝。改革开放加快了社会的发展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形成,极大地强化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运行中的“选择性”。素以严格的入学选拔制著称的中国大学,现在发现自己正面临着社会的多重选择——学生对院校、系科、专业甚至课程的选择,社会企事业单位对毕业生和科研成果的选择……

“选择性”正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新特征呈现在我们眼前。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与完善,这一特征将日益明显,更加引人注目。

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选择”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

“选择”,因为,任何决策都意味着比较、分析、判断、选择。确定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规模、速度、结构、形式等,需要审慎的选择;人才培养的规格、途径、评估标准,以及课程结构和教材使用等,也需要有所选择,有所取舍。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的“选择”,往往带有以下特点:

1. 选择的高度内聚性

由于权力集中于结构的顶层,因此,选择性决策往往由中央有关部门作出,并统一施行于整个高教系统。这种高度内聚性、统一性的典型,就是全国统一的专业设置,统一的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

2. 选择的有限性

由于选择、决策权高度集中于结构的顶层,因而对于结构的下层而言,选择就极其有限了。美国加州大学教授伯顿·克拉克曾经指出:“高等教育的结构重在基层,它特别有赖于在下层释放能量”,“高等学校的校一级是关键层次”。然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大学校长在办学过程中作出某种选择的余地是那样的少,以至于像基建经费的使用、校舍的规格标准这类问题亦要由上级定夺。这样,高等教育的基层结构失去功能,失去活力的情况,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3. 选择的单向性

高等学校根据统一的入学标准严格地遴选学生,而学生对于所学课程、所学专业等,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同样,工矿企事业单位根据统配计划接受高校的毕业生,由于是计划配置,又由于是无偿

使用,因而除了极个别情况外,几乎都是照单全收。

4. 选择的刚性

选择一旦作出,就很少有变通的可能,即便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选择”

市场经济不但强化了高等教育运行中的选择性,而且使得这种选择具有了与计划体制下的选择截然不同的特点与形态:

1. 选择主体的泛化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的选择主体主要是国家(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高等学校则身兼二职,既是选择的客体(相对国家,政府而言),又是选择的主体(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对学生、教师而言)。市场经济条件下,“选择”在多个层面、多个领域广泛地进行,并且日趋活跃。除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继续作为选择主体的角色存在以外,高校增强了“选择主体”的色彩,逐步争取到对办学方向、发展重点、管理策略、运行方式等多方面选择、决策的自主权。更为重要的是,一些新的选择主体迅速崛起。例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对高等学校的产出——毕业生和科研成果的选择,学生、家长对准备报考的高等院校、系科专业的选择,学生对所学专业、所修课程的选择,教师在继续从教与改行之间的选择和在这一高校与那一高校之间的选择……这些选择主体的出现和选择行为的活跃,正形成一种强大的“社会选择”机制,或者说市场因素对高等学校的选择以及国家政府的教育选择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2. 选择的双向性

选择不再是居高临下,单向运行,而更多地是以双向、互逆的形态出现。例如,毕业生择业和工矿企、事业选聘人才这样的“双向选择”,研究生及其导师间的“双向选择”等,已经不再是个别的、新奇的现象,而即将成为高教运行中的常态。再如,高等学校依然根据各自的标准挑选入学新生,而学生不再是被动的“选择对象”,他们开始对高等学校,对系科、专业进行严格的挑选。1992年夏,一些名牌大学的颇负盛名的系科专业,就在考生的选择中“门庭冷落车马稀”,而一些“二三流”学校的财贸、金融专业,却大获考生的青睐。

3. 选择的多样化

选择的余地明显扩展了,选择的标准更是多种多样,差异极大,变化极大。上面提及的名牌大学传统学科遭冷落,而二三流学校流行系科变热门的原因之一,在于考生的志愿选择标准由学术性转向实用性,毕业后就业前景的好坏和待遇的高低左右着相当数量的学生和家长的志愿选择。同样,教师,特

别是青年教师,在高校之间的流动,或者由高校向其他行业的流动,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不同的选择依据,导致不同的选择行为,或者是注重学术环境、成才可能,或者是追求充满风险的竞争和相对优厚的待遇。

4. 选择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

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教运行的选择是自主性与竞争性的中介——既是自主性的表现,又是竞争的前提(或者说基础)。建立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是企业行为的主体化。企业摆脱政府的行政束缚,成为具有自主经营权和独立经济利益的市场主体,其自主性也体现在用人用工的自主选择上,包括拒绝某些不合企业要求的高校毕业生,而对那些德才兼备者则不惜高筑“黄金台”。各个企事业单位对人才、技术、产品、信息等高等学校教学、科研成果的自主选择,就形成人才、技术、信息等市场的竞争,导致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

自主选择导致竞争,竞争的结果影响资源配置的变化。对企业而言,它意味着人才、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对高校而言,它意味着高质量的生源、人才(教师和科研人员)以及办学资金的获得。这一系列的变化将引起新的自主选择,以及新的竞争。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学生为了使自己的知识、技能结构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在择业竞争中占有较有利的地位,必然对所学专业、所选课程,以及任课教师有所选择;而高校也将选择新的办学方向,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计划,努力提高教学质量,使自己的毕业生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竞争力,进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提高声誉,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获取较多的办学经费。

选择→竞争→资源配置的变化→新的选择→新的竞争→资源配置新的变化……如此循环往复,螺旋前进,就使高等教育的运行充满活力,并且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互协调起来。

选择性:一把双刃剑

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中日益强化的选择性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强大动力。特别是区别于国家、高校等选择主体的“社会选择主体”(由千千万万个受教育者及用人单位组成)的出现和不断活跃,更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它迫使高等教育走出自我封闭、自我满足的小天地,把追求学术卓越与促进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把办学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结合起来,把遵循教育规律同重视市场法则结合起来,把主动适应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和主动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结合起来,确立更为广阔的发展目标,选择更有效的发展途径。

其次,它使得高等教育的改革有可能从外围向纵深发展。例如,我国高校的专业计划和课程设置主要是根据学科的内在逻辑体系,以及青年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制定的。课程的划分、衔接,以及课程体系的构建等,主要着眼于学科性,而很少考虑实际应用性。随着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遴选日益注重适切、实用,大学生对所学课程的选择意识将日益强化,他们“脚下的表决”已经把课程的实用性问题尖锐地提到我们面前。一些脱离实际、内容陈旧的课程将无人问津,而那些对大学生择业、工作有直接帮助的课程,如计算机应用、外语、公关学、管理学等,将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的欢迎。在此同时,学生对任课教师的选择也将以某种形式表现出来。这就迫使高等学校对现有的专业计划和课程设置作大幅度的调整,增加跨学科的、实际应用的课程和内容;教师也就会感觉到更新授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以吸引学生的紧迫性。此外,社会企业部门对高校科研成果的选择,特别是对应用开发研究成果的重视,以及相应的可观的经费投入,也会刺激高校重新考虑科研的布局,有利于科技成果的转化。

第三,社会选择主体的出现与活跃,将促使高等学校重视办学效率与效益,形成主动适应、主动服务、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办学机制,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以争取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教运行中的选择,尤其是社会选择,是一把双刃剑。人们在发挥它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并准备处理它几乎是必然要带来的弊端。

1. 选择的“趋利性”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和个人的行为主要受利益机制驱动,因此在资源配置的刺激下作出的选择,很可能造成失误。例如,1992年夏全国高校的扩招热、代培热、自费生热,就是一种近乎赤裸裸的“趋利选择”。由于招收自费生、代培生可以为学校增加一笔可观的经费收益,因而不顾主观办学条件是否具备,不惜降格以求,大幅度扩招。有些高校计划外招生数甚至超过了计划内招生数,有些省甚至一下扩招了两三万人。其必然后果是新生质量下降,学校师资安排、校舍使用全面紧张,结构比例严重失调。

同样,对学生及其家长在报考志愿及课程方面的选择,也应作出清醒而全面的评价。一方面,他们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需求的变化,反映了重视实际应用的趋势;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又常常因为趋利而带有“一种不幸的趋势,他们对于什么是与谋生有关的问题采取一种狭隘的观点”。在这种狭隘观点的导引下,重职业技能培训轻全面素质提高,重实用技术课程轻人文科学课程的倾向在西方发达国家日益严重,以至于在前不久,由一批

美国著名学者和教育界权威联名的报告极其尖锐地指出:“文科课程在大学课程安排计划中业已失去主导地位。在很多美国大学里,学生们像自助餐厅饥不择食的顾客一样,为在大学毕业后得以谋求一份工作而学习,竟把如何全面提高自己的和不断完善自己的远大目标抛到一边。”

因此,高等学校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及时地调整系科、专业设置以及课程体系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关键之处在于“不能单纯依靠学生自己的选择”,更不能盲目追随职业市场的变化。在系科、专业、课程之间保持某种合理平衡、逻辑联系和相对稳定性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2. 选择可能产生的短视性、散乱性

市场信息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选择。同传统的计划体制下信息变化甚慢、纵向流动等特点相反,市场信息的流向主要是横向的,又是不确定的、多变的,许多信息甚至是相矛盾的。根据这样的信息作出的选择,其短视性、散乱性也就在所难免。高等教育的长周期、迟效应等特点提醒人们在自主选择时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依据多个维度。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的高度流动和相互替代,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特点。80年代末,香港对牙医的需求量增大,引起了有关当局的注意。港英当局决定在香港大学等分别增设两个牙医专业,家长们受牙科毕业生诱人的就业前景的吸引,把最优秀的子弟送去攻读牙科。然而,来自日本、韩国、美国和台湾的牙科人才很快纷至沓来。当牙科学生们刚刚进入二年级时,香港的牙医就已供过于求,一度辉煌的就业前景顿时黯淡起来。这一例证提醒人们,高等教育要重视市场的变化,却又不能,也不应完全踩着市场的节拍舞蹈!

3. 选择的趋同性

市场条件下人们受一时的社会需求和时尚变化的影响,往往会做出同向的选择,形成某种“共振现象”。这种选择,仅仅从个体和学校来看是可行的,有益的和合理的,但是由于同向选择,从整体、全局来看,从这些选择的共振效应来看,却又是不可取的,甚至有害的。报考志愿的冷热变化,系科专业的短长转化,就是这种选择趋同造成的后果。高等教育如果不重视社会选择趋同性可能产生的弊端,就难以消除人才培养中的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共生”的现象。

4. 选择存在盲点和误区

如前所述,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选择有明显的趋利性,这就势必形成高教运行选择的一些盲点和误区。

其一,高等教育的活动有相当一部分是难以用价值、价格的尺度来衡量的。例如,基础科学和某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成果,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

究成果,是无法估价,也是不能直接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数学家杨乐曾向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一个问题:“中科院数学所是搞基础科学的,搞哥德巴赫猜想的,怎么能走向市场,谁买这些东西?但基础科学上不去,科学则后继无人。”这位最早提出“市场取向的改革”的吴教授十分赞同杨乐同志的看法,认为:“基础教育、科研和高层次的文化产品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是市场不能衡量的”,“人的情操、价值观的培养,都不是市场能解决的”。

其二,有些学科人才培养的“比较效益”远远低于其他学科,例如基础学科人才的培养,石油、煤炭、农业、师范等相对艰苦、清贫的行业人才的培养,就远远比不上外经、外贸、金融、法律和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的“比较效益”,因而也就常常被趋利的社会选择所忽视,所冷落。

其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选择主要是从本企业、本部门和个人切身利益出发的。而现代社会总有这样一类活动,其社会成本和收益并不归属于从事这类活动的个人或部门,而要归属于社会整体或其中的某一个系统结构。随之而产生一连串问题:谁来考虑这类跨行业、超部门的因素?谁来保证和支持那些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全局性和根本利益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例如国防建设,

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其他公用、公益事业等方面)?

以上社会选择的三大盲区,正是经济学家们通常指出的“市场失灵”的领域。而恰恰是在这些方面、这些领域,国家的选择以及相应的资源配置将起主要的调控作用。1987年颁布的《英国高等教育白皮书》在指出“政府将为整个大学系统提供规划方针”的同时,强调“政府将仔细了解学生逐年的实际升学要求,并对工业、商业与公用事业未来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进行重要的跨部门的考察”。正是这种建立在“跨部门的考察”基础之上的选择和规划,才能弥补市场选择的盲目、短视和误区等与生俱来的缺陷,使高等教育的运行既充满活力,又健康、合理。

不断强化的选择性,正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凸现在人们面前。如何全面地分析、科学地评价它的积极意义和消极作用,如何正确地处理好国家选择、院校选择与社会选择(或者说“市场选择”)之间的关系,使之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去弊存利,取长补短,是对高教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提出的全新课题。笔者在此仅初步提出了粗浅的思路,望引起各界学者、专家的关注和讨论。

(责任编辑 蔡德诚)

科技动态

“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获第一项重大攻关开发成果

[本刊讯] “产、学、研”是国家经贸委、国家教委、中科院 1992 年开始联合实施的开发工程,旨在推动企业、高校、科研三方建立密切、稳定的交流合作制度,推动“产、学、研”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速高技术产业化推进。

最近“产、学、研”获得了第一项重大攻关开发成果——具有国际首创性的“细旦、超细旦丙纶长丝及制品”已由科研发明进入批量投产阶段。这是继我国 60 年代丁二烯合成橡胶之后又一项将产生重大经济技术效益的、将形成大规模产业的人工合成科研、开发事业。它将为我国纺织工业、服装工业提供新型、高质量、大批量的高级合成原料。

细旦、超细旦是纤维的纤度单位,1 克重 9000 米长的纤维为 1 旦,蚕丝的纤度为 1.1 旦。在仿真化纤中,细旦、超细旦丙纶是国际上开发最晚、难度最高的一种。两

年前,中科院化学所在 20 余年研究的基础上,与中国纺织大学密切合作,共同推出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细旦、超细旦丙纶丝制造技术。这次又经过近一年的与企业联合产业化开发,使我国达到了在 300 吨专用树脂生产能力(1993 年底可达 1000 吨)量级上的 0.8 旦到 1 旦左右的、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多种颜色的丝和异型丝批量产丝能力。而目前国际上此类产品尚不能批量进入市场。因此,“产、学、研”此次联合项目的重大进展,对我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国际、国内市场大规模的领先开发和竞争,有重大意义。

实际上,这次重大成果和进展,也展示了我国产业、高校科研各界联合、联手开发的一条有效途径,显示了这一合作方式的广阔前景和巨大潜力。当然,如何促使产业化后的经济效益有机地、有远见地再反馈于科研、发明,仍是个有待深化探讨、解决的核心问题。